

蒋介石和冯玉祥

蒋介石和冯玉祥同处国民政府的中枢地位。他们自1928年换帖结盟成为生死弟兄。至1948年彻底决裂成为冤家对头。这二十年是密切交往、秋波暗送的二十年，也是风风雨雨、若即若离的二十年。其间，有携手并肩的合作，有利害之争的冲突，有政见不合的分裂，最后终于铁面相向。他们已属于历史，但在历史背后的他们之间千丝万缕的情缘、恩怨将展现在您面前。

蒋介石
政治关系
大系

周玉和 / 著 · 吉林文史出版社

K827.6
75

蒋介石政治
关系大系

蒋介石和冯玉祥

周玉和 /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 新登字 07 号

Jiang jie shi He Feng yu xiang
蒋介石和冯玉祥

周玉和 著

责任编辑:宋一夫 李 岩

封面设计:章桂征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5插页 180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印数:1—10 260册

定价:8.00元

长春科技印刷厂装订

新华书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ISBN 7—80528—624—8/K·328

目 录

一、机 缘

两位总司令	1
南北革命军	8
会师陇海线	14
见面泪沾襟	19

二、换谱结拜

“中正弟”与“玉祥兄”	25
拉向自己一边	28
辞职与结婚	32
赶跑了一个，气走了一个	36
“惟盼吾兄东山再起”	38
联手“北伐”	41
患难与共，接力捣幽燕	45

三、裂 痕

秘密交易	50
外交风波与消极抗命	53
哭灵与追悼会	57

059/09

吵，从北平吵到南京	60
大哥“病”了	64

四、中原大流血

脚踏两只船	70
金钱的魅力	73
爽约与上当	78
吃了回头草	83
兵马战犹酣	87
瓦解与受挫	93

五、辱国·卫国

“九月十八日来了日本兵”	97
不抵抗主义和它的背后	101
“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	107
鬼子进关以后	111
泰山，离而复归	118

六、走向联合

南京发出密电	125
两种谈判	130
“七君子事件”的透视	137
在实现和平进程中	140

七、共赴国难

炮响，“守土抗战”	148
会战，出任司令长官	154
限制民众与发动民众	160
他们都无可奈何	165
外战中的内战	170
真诚的联合	176

八、建 国

只请客，不做菜	183
好酒，一百度	188
协议，只墨写在纸上	193
呼喊，从内心里发出	198
战火又起	201
临别赠言	205

九、决 裂

矛盾公开了	209
战场外的搏斗	214
决裂，彻底的决裂	220
遗嘱	226

十、人去与魂归

一、机 缘

起先，他们素不相识，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

起先，他们并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一个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一个是曹锟、吴佩孚属下的一员战将。

可是，他们还是走到一起了。

凡事都有个原因，两个人的相互联结，不论男人或女人，总要有个机缘。

他们的机缘是什么呢？是：1926年至1927年的那场大革命。

两位总司令

1926年7月9日，广州东校场。旌旗招展，人头攒动，10万军民云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封建势力！”等口号声，此伏彼起，响彻云霄。

这里正在举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

一位年约40岁的中年男子，身着戎装，昂首挺胸，神采奕奕，站在主席台上，一阵掌声过后，他发出了浓重的浙江话音：

“今天，是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的纪念，亦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本总司令自觉才力绵薄，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惶恐万分。但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

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天职，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自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末尾几句淹没在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中。

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赫赫有名的蒋中正，字介石。他的名字很多，但他从政后经常用的就是这一“名”一“字”，而人们则普遍以“字”相称，“蒋介石”三个字，可以说是声震中外，人人皆知。

两个月后，也就是这一年的9月17日，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偏远小镇，举行了另一个誓师大会。

五原，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当年是绥远省的一个县城。这里，比不得广州，它贫瘠、荒凉，人烟稀少。汇集在这里的队伍——一部分国民军，也比不上国民革命军，它人数不多，衣着不整，枪械不齐，是一支溃散后重新收容起来的队伍。

然而，将士们队列齐整，精神抖擞，内心充满希望，脸上带着欢欣，在这座县城的小小广场上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广场一侧的一座土台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将一面国民党党旗高高举起。一位年约45岁的军人站了起来，他身躯高大魁伟，神态庄严郑重，浓眉下的双目炯炯有神，扫视了一下于右任，注视着在秋风中飘展的党旗，迈开大步，双手接了过来，面向台下将士，发出了洪钟般的声音。

他宣布，受各将领公举，他出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誓就职。

他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集体参加国民党。

他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参加国民革命。

他宣读了誓词：

“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

这位国民联军总司令，就是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冯玉祥。他同蒋介石一样，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同样闻名遐迩，同样中外皆知。

两个人自然还有不同之处。此时的蒋介石正在仕途上奋力攀登，从响应辛亥革命到出任总司令，不像冯玉祥那样艰辛、坎坷，凭他的机智、努力和计谋，基本上是扶摇直上、步步青云——

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蒙难永丰舰，蒋介石应召来到孙的身边，帮助筹划，并肩战斗，护送脱险，平安抵沪。此举不能武断地视为“投机”革命，临危受命，患难与共，总是需要一定的真诚。但是，它也给蒋介石带来了扩大影响和抬高身价的绝好机会。聪明的蒋介石，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与孙中山同登永丰舰，坚持同叛军战斗者，不止蒋介石一人，然而只有他在事后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中山在序言中对他称赞不已：“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

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使蒋介石得以出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在1924年5月正式当上了该校校长。起初，蒋介石曾因不能插手党务和军政大事，而一度消极。但是后来他却感到这一职务对他的重要意义，因而紧紧地抓住它，充分地利用它，掌握了一批为我所用的军事干部，进而建立起

听命于自己的嫡系部队。

1924年下半年和1925年，是广东革命政府的多事之秋，蒋介石率队镇压了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陈炯明，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这几次军事行动的胜利，有赖于共产党人的参与指挥和政治思想工作，有赖于工农民众的积极支援，同时，也与蒋介石的指挥密切相关，从而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和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此前后，除了黄埔军校校长之外，他还担任了多项军事要职：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国民革命军总监（相当于后来的总司令）。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施展计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将共产党员排挤出了国民革命军，使这个军成为他一手独揽的嫡系部队。这一年的5月，蒋介石为了限制共产党、夺取国民党党权，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当然，这又是一个计谋。经过这一“整理”，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被“整理”下来，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怀有二心的右派分子被“整理”上去，而获取更大、更多权力的是蒋介石，他此时担任的职务有：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部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对蒋介石来说，地位越高越好，权力越大越好，他在总司令部组织大纲里又做了这样的规定：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凡

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就这样，蒋介石在“总司令”和“独揽大权”之间加了一个等号，而前者就是他自己。

国民革命军即将大举北伐，给蒋介石这位总司令带来了施展抱负的大好机会。这时，他虽然是大权独揽，但所辖地区只有广东、广西，中国绝大部分省区还在北洋军阀控制之下，实现孙中山遗愿也好，统治全中国也好，他都要率军出征，进行国民革命。

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同蒋介石相比，则有许多差异。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他不像蒋介石那样幸运有个盐商的家庭，有出国留学进入军事学校的机会，他幼年家境贫寒，12岁即吃粮当兵；他没有蒋介石那样染指证券交易所的经历和投机巧取的素质，而是凭借苦练、勇猛、实干和才能，从士兵依次升迁，旅长，师长而督军；他在走向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更不像蒋介石那样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和艰辛——

冯玉祥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早年就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大潮中，他和其他革命官佐发动了滦州起义，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参加了反袁护国战争，1917年他又率军平定了张勋复辟。这些行动反映了反对专制、维护共和的进步倾向，但这时的冯玉祥却未能跳出北洋军阀营垒，仍然是其中的一员战将。

从1920年开始，冯玉祥和孙中山建立了联系，他的爱国为民思想日增，革命倾向日浓，而吴佩孚的压制与排挤，又把他自我发展的道路堵死，于是，他乘第二次直奉大战正酣之机，于1924年10月毅然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推

翻了直系统治。冯玉祥将这次政变称为“首都革命”，严格说来，此举还算不得革命，不过，它却是冯玉祥从北洋军阀营垒向革命迈进的起点。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并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出任总司令。但是，冯玉祥的军事实力有限，还不足以控制整个局势，他在思想上对革命对军阀，还缺乏本质的认识，因而，北京政变的成果很快就落到了段祺瑞和张作霖手里，他却受到了排挤，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离京到张家口赴任；国民军名称被取消，改称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西北军的名称即由此而来，但习惯上仍沿用国民军这一名称。

冯玉祥倾慕孙中山的主张，倾向革命，并和苏联取得了联系，国民军所辖地区的民众革命斗争不断发展，在北洋军阀眼中已成了“赤化将军”。1926年1月，张作霖和吴佩孚，这两个杀个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又联合起来，会同其他军阀，先要“扑灭北方赤化”，而夹击国民军。形势所迫，冯玉祥只好宣告下野，西北边防督办一职由张之江代理，想以此来避免敌对势力的攻击，保存国民军这支从北洋军阀冲杀出来的队伍。

1926年3月，冯玉祥启程赴苏联考察，4月初途经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时，与前往广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于右任、陈友仁、徐谦等国民党人相遇，商谈了国民党与国民军合作问题，并经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鲍罗廷等按原计划转赴广东，徐谦留下来同冯一起赴苏。5月9日，冯玉祥一行抵达莫斯科。苏联军政官兵的热烈欢迎，中国留学生高举的“欢迎人民军队领袖”的大幅标语和“中国国民军万岁”的口号声，使冯玉祥深受感动，向记者们说：“在俄国，

找到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榜样。”

冯玉祥的下野与出国，并没有使张作霖、吴佩孚等放弃对国民军的进攻。国民军四面受敌，被迫放弃原来驻地，向南口方向撤退。4月15日，各路敌军50多万人围攻南口，国民军只有20万人，在敌众我寡、给养困难、饷械无继情况下，凭险据守，艰苦抗敌，8月15日退却突围，撤向绥远、陕西、甘肃一带。

冯玉祥在苏联会见了许多重要的苏联领导人、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和在苏的中共人士，参观了军事学校和工厂，接触了工人、农民和士兵。新型的苏维埃国家，使他感到新奇、振奋，广泛的接触与交谈，使他决心为国民革命而战。6月，他派出代表回国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联系，7月，双方决定：国民军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国民政府对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

7月下旬以后，冯玉祥陆续得到了国民军南口大战和撤出南口及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消息。国民军的现状与处境，急需他重装旗鼓；国民革命的进展，催促他率军出征。8月17日，冯玉祥一行离开莫斯科，踏上了回国的路程。

冯玉祥此次出国与回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他不仅明确了方向，下定了决心，而且还请来了苏联顾问和帮他做政治工作的刘伯坚等中共人士，同他一道回国，在弹药接济和装备支援方面也得到了苏联允诺。

9月16日，冯玉祥一行到达五原。这时，国民军各部也纷纷向这里集中。17日，国民军各将领推举他为国民联军总司令，他发表了就职宣言，即五原誓师宣言。

冯玉祥在这篇长达3 000多字的宣言中，明确宣布奉行孙中山的主张，服从国民党，拥护国民政府；回顾了自己的经历，说明了自己“倒戈”的正义性和进步性；深刻地批评了自己以前的政治主张；阐明了联苏反帝的必要性；指出国民军应与民众结合，贯彻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

就在这一天，冯玉祥率领国民军将士，举行了前面提到的五原誓师。

冯玉祥经过多年的摸索与苦斗，终于加入了革命行列。

南北革命军

蒋介石统率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共有8个军，10万人。第一军至第六军驻广东，军长依次为蒋介石（后为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驻广西。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驻湖南。

这支部队虽然大多数来自旧军队，但它却是依照苏联红军的榜样，建立或改造而成的新式部队，聘请了苏联顾问，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一些共产党人担任了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政治素质和战斗能力都有显著变化，非以往的军阀部队可比。不过，这支部队毕竟是从军阀部队脱胎而来，仍然带有旧军队的印记，从蒋介石到各军军长及其他高级将领，大敌当前，大都能够为国民革命效力，但当工农民众真正起来，他们又惧怕革命，把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又领回了原来的老路上去。

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五原誓师时，除原驻甘肃的以外，不足5万人，但经过冯玉祥亲自检点整顿，全军井然有序，精

神振奋。同国民革命军一样，国民军也聘请了苏联顾问，成立了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冯玉祥出任党代表，并在中共人士帮助下，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成为一支富有革命气息的部队。

同样，国民军也是来自旧军队，自然也存有许多旧东西，冯玉祥本人也是如此，他重新组建了一支致力于国民革命的部队，但当基本打垮北洋军阀之后，他又把这支部队作为发展自己的资本，又回归到军阀营垒中去。

南北两支革命军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北洋军阀。这时，北洋军阀不仅掌握着中央政府，控制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而且军事实力也远远超过革命军，盘踞各省的地方军阀不算，光是三支大的军阀就有 75 万人的兵力，其中：

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 20 万，控制河南、湖北和湖南大部及直隶南部等地。

原为直系，现已自成一派的孙传芳，也是拥兵 20 万，盘踞苏、浙、皖、闽、赣五省，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

奉系军阀张作霖，有 35 万人马，占有东北和山东、直隶、热河、察哈尔等地，并控制着北京政权。

直奉两系军阀，为了权势之争，在 1922 年和 1924 年的两次大战中，曾打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这时，为了共同对付革命，他们又联合起来，在北方，合力攻打国民军，在南方，企图以直系全力进攻广东。孙传芳表面上观望，挂起“保境安民”招牌，实际上也在积极备战，伺机进袭广东。

国民革命军根据敌众我寡和军阀部队的态势，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即先打吴佩孚，再打孙传

芳，最后消灭张作霖。为此，国民革命军除一部留守广东、广西外，绝大部分兵力都开往北伐前线，其中投入湖南、湖北的就有八、九万人，以五、六万人攻打吴佩孚，以3万左右人警戒江西，防堵孙传芳援吴。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之前，1926年5、6月间，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和两个师及第七军，就已先后入湘援助唐生智，稳定了湖南战局，与唐的第八军相配合，7月11日，攻占湖南首府长沙。一个月后，即8月11日，以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和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抵达长沙。他们从广东出发，一路上受到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长期受战乱之苦的湖南民众显得尤为热烈和真诚。蒋介石等到达的前一天，长沙5万多欢迎群众，从炎热的中午就开始恭候，一直到次日凌晨3点才一睹总司令的风采。民众对北伐军的支援与欢迎，使蒋介石激动不已，他说，北伐军从广州到长沙，沿途民众燃放鞭炮致敬，为北伐军带路挑担、供粮供水，表现了真诚相助之意。

8月12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将战争引向湖北，直捣武汉。会后，北伐军发起攻击，连克平江、岳州，进入湖北境内。8月27日和30日，北伐军先后攻克粤汉路上的两个军事要隘——汀泗桥和贺胜桥，9月1日，进逼武汉。

9月3日，蒋介石到达武昌近郊，指挥攻城。5日，强攻武昌，不下。但吴佩孚受炮火威胁，北逃河南信阳，留下城防司令刘玉春率3万人死守。6日和7日，北伐军先后进占汉阳和汉口，武昌在围困中，攻克只是时日问题，湖北战事大局已定。

主要战场转向江西，除一部留守两湖和围困武昌外，北

伐大军东移，9月19日攻占南昌。孙传芳调精锐部队反攻，22日展开激烈争夺，蒋介石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不听调遣，并且夜宿妓馆，使得军中无主，与敌刚一接触，即全军覆没，王柏龄和师党代表缪斌只身脱逃。23日，北伐军被迫退出南昌。

中山舰事件时，蒋介石将共产党人排出了第一军，使得这个军纪律败坏，战斗力日衰。这次开赴江西作战的第一师和第二师，欺压群众，强占民房，军官们吃空饷，非嫖即赌，许多士兵吸毒抽大烟，这些堕落败坏情形，蒋介石一清二楚。为此，他感到脸上无光，十分气愤，早在7、8月间，就曾几次训斥王柏龄等人，“不能严振风纪，败坏第一军之名誉”，要求他们“各发天良，严约所部”，甚至说：“如果不能照我的话做到，我不再讲什么话，只有多预备几颗子弹，来枪毙我自己的学生。”可是，蒋介石的“痛诫”丝毫不起作用，第一师在南昌争夺战中仍然是长官嫖妓，全军覆没。蒋介石说的话也根本不能兑现，对只身脱逃的王柏龄，不但没有枪毙，也没给任何惩罚，反而继续重用。凡是忠于他的黄埔系军人，即使犯法有罪，也会受到庇护和提拔的。

1926年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15周年纪念日，围困武昌的第四军，以叶挺独立团打先锋，一举攻下武昌城，生俘刘玉春。至此，吴佩孚的主力基本消灭，两湖战场胜利结束。

第四军作战勇敢，屡克强敌，被誉为“铁军”，尤其是叶挺独立团，骨干力量为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战功卓著，纪律严明，破城夺隘，负有盛名，北伐名将叶挺，更是家喻户晓，广为传扬。

攻克武昌的第二天，10月11日，江西方面的北伐军再次围攻南昌，12日，蒋介石亲自指挥攻城，未果，大军后撤。